

（二〇一七年三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各抒己见】	评王复兴的《抢救记忆》	舒 声
【亡灵祭坛】	人民大学教授蒋荫恩之死	张宝林
【往事非烟】	红卫兵打死人之后	乔晞华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八）	王复兴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各抒己见】

评王复兴的《抢救记忆》

• 舒 声 •

原北京大学历史系65级学生，现居美国的王复兴先生2016年写了一本《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在一些网刊上部分连载，产生一定影响。笔者作为他的校友，亲历了北大文革，认真地阅读了全书，对该书有以下几点评论。

一、该书的可取之处

1、该书第一章《文革前夜》，记述了在作者在北京四中学习期间学习九评、学潮和社教的情况，提供了一些文革前夜发生在中学的实际情况，认为“文革确实发生在文革之前”，“四中的学潮和社教是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序幕和预言”（该书35页），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2、该书的第二章《1966年：文革爆发》记述了北大历史系开展文科试点，下乡半工半读，搬到昌平太平庄，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晚上政治学习或开展史学批判，以及邓拓、宋硕、陆平、彭佩云、翦伯赞等2月1日参加开学典礼等情况，应是北大文革前夕的真实记录。

3、作者的祖父王卓然是与张学良关系密切的“东北帮”元老之一，1968年被关入秦城监狱，父亲王福时解放前在美国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一些活动，1957年被打成右派，弟弟王复光1968年8月2日在海南兴隆农场被对立派的民兵队长开枪打死，作者一家都是文革前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这些遭遇都值得同情。

4、作者虽然“出身不好”，但却不像别的同类学生那样在文革中谨小慎微，而是积极地投入文革，得到风云人物聂元梓的信任，有时还特地带上他参加一些重要活动，他和孙蓬一、李清昆、宋一秀等北大文革重要人物都有交往，并组织了跨系的“红旗兵团”、“66串联

会”等组织，因此比一般群众了解情况多一些，在书中提供了一些“记忆碎片”，并试图把这些碎片拼接起来，虽然拼接的并不成功，但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这种“抢救记忆”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5、作者作为北大文革中“新北大公社”一派的重要成员，虽然自始至终拥护校文革和聂元梓，但在面临武斗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反对校文革和公社中的极端分子的做法，反对武斗，这一做法无疑也是可取的。

二、混乱的思维逻辑和错误的结论

该书最大的缺点就是整体思维逻辑比较混乱，导致做出错误的结论。

1、关于校内两派的形成和矛盾

凡是有一点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外因只是变化的次要因素。校文革成立之初，全校绝大多数群众都是拥护支持的，聂元梓这个得到最高领袖支持的“左派领袖”声望如日中天。但是聂元梓掌权后便得意忘形，独断专行，在校文革内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先后把昔日的“战友”孔繁、杨克明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清除出校文革，又把不紧跟他的聂孟民（副主任）、牛占文、刘宗义、廖淑明（常委）赶出校文革（《新北大》1967年2月14日）。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残酷打击反对她的群众组织井冈山、红联军，把杨勋、杨炳章、乔兼武等送进监狱，残酷批斗中文系学生陈一谔，逼死中文系女生沈达力。在整风中拒不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把善意提出意见的郭罗基打成“机会主义分子”。在文革中设立劳改大院（牛棚），关押大批干部、教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连被中央明令保护的科学家周培源也被他们打成“美国特务”，设立专案，并企图抄家抓捕。事实让许多有良知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北大群众认清了校文革和聂元梓的真面目，毅然走上反对聂元梓的道路。例如笔者和班上大部分群众原来都是支持校文革和聂元梓的“北京公社”成员，1966年11月1日，在东大操场还举办过纪念“第一张大字报发表5周年”纪念大会，由我班同学程某某主持，请聂元梓发言，会后程同学拿出毛主席语录本，恭敬地请聂元梓签字留念。但是从1967年3月整风后聂元梓那种文过饰非、死顶硬抗、排斥异己的做法令人实在失望，许多人不得不走上反对她的道路。王复兴书中说的“北大3月的整风波浪，使新北大公社出现一道裂缝，到了6月5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来到北大，看准了裂缝，蓄意投下一颗巨石，要把他所说的北大“一潭死水”掀起“大风大浪”，而造成北大的大分裂。”（144页），则过分夸大了陈伯达讲话的作用。事实上，在陈伯达来北大之前，北大已经有几个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群众组织成立了，即使没有陈伯达的讲话，北大两派也是要分裂的。而死保聂元梓和校文革“红色政权”的人，当时固然是受到“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思想的影响，情有可原，但是现在还抱着原来的思维方式，继续支持聂元梓，甚至为其辩护，这种认识是否太落伍了？

2、关于聂元梓反对潘、吴就是“反中央文革”、反“极左路线”

近年来原新北大公社动态组长胡宗式连续在网刊《记忆》上发表文章，宣扬聂元梓在校文革中反对潘梓年、吴传启，并形成这样一个逻辑，反对潘、吴就是反对王关戚、反对王关戚就是反对中央文革，所以聂元梓在校文革中不仅无过反而有功。王复兴在书中延续和重复了胡宗式的逻辑，他写道：“1967年1月至9月，在北京、在北大，从上至下，曾经存在过反左与反右之争。而先知先觉者抵制极左路线，反极左思潮是历史进步因素，具有重要意义。”“1967年，以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为代表的一派，抵制了极左路

线，冒着极大风险，以进攻姿态，反极左思潮，反吴传启，反林杰，反谢富治，这是历史事实。”“客观上，新北大不自觉地抵制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见该书185页）把聂元梓等人打扮成了抵制极左路线反极左思潮的“先知先觉者”。

而事实是自从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掀起的夺权风暴后，聂元梓积极活动，亲自出马，联络蒯大富、王大宾等人，勾结洋造反派头头李敦白，企图成立“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见张从“胎死腹中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一文，党史博览，2016年第2期，26—27），并派出人马到一些中央部委去夺权，在夺权的过程中遇到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吴传启一派和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一派的反对，形成了矛盾。在文革中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凡事都要追后台，聂元梓等人把吴传启和谭厚兰的后台定为林杰、关锋等，从而形成这样一个逻辑：反吴传启就是反林杰、关锋，就是反王关戚，就是反中央文革，就是反极左路线。这种逻辑当然是不能成立的。聂元梓不在北大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而是到处伸手夺权，甚至想当北京市的一把手，和谢富治发生矛盾，这种情况至多只能算是“争权夺利”而已，算得上什么反极左路线的英雄？聂元梓是在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的扶持下才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和造反派领袖的，1967年还当上了首都红代会核心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她对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感激涕零，俯首听命，怎么会去反对中央文革和抵制最高领袖的极左路线呢？

3、关于对聂元梓错误和罪行的认识

作为文革发动者和中央文革的在北大的头号代理人，聂元梓在文化革命中犯下了严重错误甚至罪行，导致她在文革后被判刑17年。在彻底否定文革和清算文革灾难，回顾总结北大文革历史时，必然要对聂元梓和校文革进行批判和否定。但在王复兴的书中，总体上对聂元梓充满同情，对她犯下的错误和罪行轻描淡写，在一些问题上却千方百计地为其辩护甚至美化。该书说：“聂元梓的最大错误，是从1966年5月至1967年1月，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反陆平，反彭真，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坚决批判资反路线，坚决炮打刘邓司令部，犯了左倾政治思想之错而不是右倾”（130页）。意思就是聂元梓只是在这半年多有政治思想错误，而其后就没有什么错误了。该书还说：“当年聂元梓、孙蓬一领导的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其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斗争矛头不是指向老干部重点“走资派”，而是指向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不是反右，而是反左。它属于人民的文化革。它实际上是抵制了毛泽东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91页）更是罔顾事实，对聂元梓、孙蓬一和校文革的恣意美化。事实上聂、孙和校文革在反“走资派”方面做的不比任何造反派组织差，他们第一个贴出反邓小平的大字报，第一个在校刊上点名批判朱德同志，他们把持的舆论工具《新北大》大量刊登“揭发”“批判”党和政府、军队领导人和政府部门负责人的文章，据统计，被他们点名批判的有：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陶铸、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彭真、谭震林、罗瑞卿、习仲勋、李雪峰、李井泉、王任重、陆定一、胡乔木、杨成武、傅崇碧、廖汉生、吕正操、王恩茂、黄新廷、荣高棠、周荣鑫、周扬、齐燕铭、刘仁、万里、邓拓、吴晗、赵凡、冯基平、杨述、廖沫沙等，其中很多人点名的时间还抢在其他报纸的前面。就在该书说的聂元梓“反左不反右”的1967年4月，聂、孙在校内组织多次批斗大会，批斗彭真、陆定一、李维汉、徐冰、刘仁，万里、许立群、韩光等老干部和王光英等民主人士，7月14日，又把胡耀邦、胡克实等共青团中央的干部揪到北大批斗。（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更为严重的是聂孙在校内残酷迫害广大干部教师，镇压不同意见学生的错误和罪行，挑起和制造武斗，造成大量干部、教师、学生非正常死亡和残疾。至于聂元梓实行个人专制和愚民政策，破坏了北大长期形成的科学民主的传统，给北大师生造成的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的。

该书作者总体上否定文革，但在具体问题上又试图为文革中的代表人物犯的错误和罪行开脱，甚至美化，这就使作者陷入逻辑混乱和自相矛盾的境地。

三、缺乏科学的史学态度和严谨的求实精神

王复兴虽然是历史系的学生，但缺乏科学的史学态度和严谨的求实精神，经常不经过严密考证，有些是道听途说，就作为事实根据，妄下结论。

例如该书写道：“在1966年6月中旬，哲学系66成员”顶风船队长赵某某和史某某两人找我，他们表情严肃，告诉我，他们在“红旗飘”总部办公室窗外，偷听了牛辉林等人讨论形势。牛辉林分析：当时中央的路线斗争是新文革和旧政府的斗争，周恩来到处救火，灭火，保护老干部，是新保守派的总后台。聂元梓和北大公社就是保周的新保皇派。他们要反聂，反周，造反到底（这就是牛辉林“红旗飘”秘而不宣的纲领）。（该书165页）。且不说文中所说的1966年6月的时间不对，那是还是工作组时期，“北大公社”和“红旗飘”根本没有成立，也不说牛辉林的宿舍是在三楼楼上，根本没有什么总部办公室，那两个人能在三楼窗外偷听吗？即使是他们偷听到了，这些只言片语能够作为证据吗？把几个学生在一起议论的几句话就作为“秘而不宣的纲领”，这个结论能够成立吗？

又如该书叙述1966年9月，历史系23名教师干部被系文革送到太平庄劳改，竟说“太平庄的劳改营既清静又安全”，“按郝斌回忆，比起燕园牛棚时的挂牌劳改，被人围观、辱骂，在太平庄倒是清静了许多，少了许多侮辱。”“像北大校园那样整天的追逐、围斗，就幸免了。”（该书79页）把太平庄描写得似乎是世外桃源。可是作者在这里完全是断章取义，甚至是断句取义，因为在郝斌所著的《流水何曾辨是非》一书中，“就幸免了”后面不是句号，而是逗号，紧跟着就写道：“可监管的学生又想出了新招。我们一日三餐，餐前要在毛主席像前列队，弯腰低头，由被制定的一个人朗读一段语录，而后我们一起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接着，一个一个地分别报出自己的姓名，但在姓名之前，要加上自己的‘帽子’。”之后，又叙述了监管学生如何批斗辱骂向达先生，如何半夜在断崖上斗争杨人梗先生等事实，以致在从太平庄回校不久，向达先生就因病救治不及而去世。（郝斌：流水何曾辨是非，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79、89页）。1967年，周一良、郝斌等历史系教师，又被二次押回太平庄，一关20个月。“其中约有半年可称得上是暗无天日。监管学生不但人数大增，而且手里还添了长矛和用自来水管加工改制的短棍。一天之内，我们要7次列队集合，7次背诵“语录”。其中晚点名一场，总要喊出一两个人，轻则斥骂，重则动手。”“1968年6月的某日，监管学生聂玉海对着周一良先生，一个嘴巴就抽过去，周先生的嘴角立即流出血来；跟着左右开弓，周先生满脸是血。（郝斌：截屏一瞥周一良，江淮文史，2017年第一期，37页”。王书又说：“近年郝斌曾向在某大学任教的高海林隔空喊话，要高海林忏悔，道歉”（该书80页），也是搞错了人，喊话的不是郝斌，而是周一良先生，后来周与高也并未相逢，所以该书说“历经劫难之后，周老师与学生高海林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实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和解的一件美谈”（王书第82页），也是夸大其词。正如郝斌先生说的：“周先生的海量，说来也不比曼德拉狭小多少，可他成就的不是佳话，却是个“剃头的挑子”！（郝斌：截屏一瞥周一良，江淮文史，2017年第一期，46页）

再如该书记述“3月29日（1968年）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到北大视察，制止武斗，聂元梓陪同。他们走到28楼‘井冈山’总部楼下时，迎面走来3、4个‘井冈山’的人，动手就打。李钟奇的头部被打了一个大包。有人用刀子划伤了聂元梓的头部，血流了一脸，染红了上衣。后经检查、包扎，只是皮外伤。”也完全是道听途说，毫无根据。具体情况，当时在现场，后被污蔑为“刺杀聂元梓的凶手”的化学系63级学生樊能廷和经济系

学生蔡华江有专文记述（见《燕园风云录》第三集，樊能廷：北大刺聂真相，6—17，蔡华江：我所见证的“刺杀聂元梓事件”，17—19），说明所谓刺杀聂元梓的事件纯属子虚乌有。

还有，该书第100页写道：“66年12月至67年2月‘井’、‘红’、‘主义兵’垮台、解散，当时校文革并没有把‘井’、‘红’打成‘反动组织’，也没有把对立面学生打成‘反革命’，那些说法都夸大其词，不符事实……。一般没有给他们戴什么反动分子的帽子，更没有入‘档案’，那时档案管理已停了。”这种说法也不符合事实。1967年2月1日《新北大》第一版到第四版刊登了长篇文章：“彻底清算北京大学红联军、井冈山别动队虎山行的反革命罪行”，点了学生杨作森、卞宗美、吴可、刘秉慈、尹火、吕润请、王山米、魏秀芬、王志新的名；1967年2月7日第一版：“北京大学井冈山红联军一小撮反动头目的丑恶嘴脸”，点了教师杨勋和学生杨作森、魏秀芬、乔兼武、张西玲、路远、周闯、杨绍明、邓朴方、卞宗美、刘秉慈、尹火、王山米、赵丰田、王棉棉、俞启义、陈延成的名。这些学生分别在校、系系会上遭到批斗。文革中虽然正常档案制度暂停了，但校文革的保卫组（二组）一直在整干部和学生黑材料。1967年7月10日，部分群众查抄了二组，在查出的材料中，仅整“井红”的材料就有56斤重，其中有“井红反动言论集”13集，每集都有100多页，“井红”的主要负责人张志握、俞启义、赵丰田等，每个人都有“反动言论集”。哲学系65级学生罗雪莹参加“红联军”仅10几天，就有了厚厚一叠子材料，其中有一条罪状是：“去年8月底，作为哲学系文革委员的罗雪莹带领20多人外出串联，破坏了哲学系的运动”。在燕南园63号的澡盆下，发现了被隐匿的一份卷宗，日期是67·5·6，黑体字是“反动学生的材料”，目录上列了10个人，中文系62级女生沈达力被列为第5名，她已经在1967年3月17日被迫害自杀了，校文革二组依然不放过她。（1967年7月26日《新北大报》第三版：“彻底砸烂北大的特务机构——黑二组”）

至于该书中由于不严谨出的错误更是不胜枚举，仅就笔者发现的列举如下：

1、该书第7页：“1986年9月，父亲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图书馆主任一职离休时，关于何时参加工作的问题，是由乔冠华、刘思慕、刘尊棋等人出的证明，证明父亲是于1948年参加的革命工作，是从在美国发行《远东通讯》算起。”经查，乔冠华是1983年逝世的，怎么可能在1986年为王父出证明呢？

2、第43页：“那时（1966年6月）北大校园内，人群熙熙攘攘，入夜还有许多小商小贩推车叫卖做生意，有卖茶叶蛋的、煮花生的、热包子的。按现在说法，有点像大型嘉年华。”实际情况是上个世纪60年代，城乡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根本不允许小商贩活动，北大校园里从来没有这些个体商贩出现过，而且买粮要粮本粮票，鸡蛋、花生都是定量供应的，小商贩也不可能卖这些。

3、第67页“孔繁、杨克明、徐运朴、侯汉清后来退出校文革，也没有想着征求选民意见”。孔繁、杨克明是被聂元梓操纵的校文革开除的，并非自己退出的，徐运朴、侯汉清后来参加了井冈山兵团，也没有自己宣布退出校文革，更无法征求选民意见。

4、第170页，1967年8月17日，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核心组成员有周培源、侯汉青（应为清）、徐运朴、孔繁、杨克明、郭罗基、牛辉林、陈醒迈、靳枫毅等11人，有误，孔繁、杨克明当时不是核心组成员，他们是1967年11月18日才参加井冈山兵团的。

5、第210页，说“东总”骨干刘澜波是水电部长、于毅夫是统战部长，都有误，他们文革前都只任过副部长。

6、第108页，101中美术教师陈南昆被殴打致死，应为陈葆昆；109页北工大的谭立夫应为谭力夫，99页樊立群应为樊立勤。

类似的错误在该书还有多处，不再一一列举。

总之，由于作者主观、客观方面的局限性，这本书是一部片面性很大的作品，不能告诉读者一个真实全面的北大文革，如果想要获得北大文革历史的真相，还需要得到更多的信息，希望更多的亲历者和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写出自己所了解的北大文革情况，给读者和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

~~~~~

## 【亡灵祭坛】

人民大学教授蒋荫恩之死

• 张宝林 •

(一)

1968年4月7日中午，我刚吃完饭回宿舍不久，忽听得窗外一片嘈杂，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出去看个究竟。

新闻系宿舍在人民大学的南一楼。南字头的楼全用灰砖砌成，两层，好几栋，一模一样，后面几栋依次叫南二楼、南三楼……语文系、经济系、党史系的宿舍都在这里。这几栋楼离学校西门很近，南面紧挨着大操场。

小楼朴实无华，东西两头和中间有楼梯，每个楼梯下的斜角，都隔出一个小杂物间，放些笤帚簸箕之类。靠南边有宽大的走廊，隔三四米一根柱子。一层的走廊高出地面一级踏步。二层走廊的外沿有半截隔墙，宽宽大大，中间还留着一排十字漏窗。

走廊的北边就是宿舍，一间挨一间，每间有一窗一门，从东向西连续编号，总共大约二十间。房间不小，放四张双层单人床还富裕，住八个人没问题，但是只安排五六个人，空铺放箱子。中间一人一桌，对着拼成一个大长桌。

我的舍友有杨义、王汉文、姜文斌、邬善康、李佳金。屋里冬天烧煤炉，夏天穿堂风，住着还是很舒服的。楼中间，有厕所和水泥盥洗池。池子半人高，一圈水管子。

我从1965年考进新闻系，已在这个小楼生活了近三年。可惜的是，从1966年6月革文化的命起，我们就不上课了，整天“斗批改”，瞎胡闹。

我之所以这么详细地描述小楼的结构，是因为接下来要叙述的事，与这个楼的结构有重要关联。

我当时住在二楼东边，出门一看，走廊里已有不少人，而且东边的都往西边走。

“谁啊？”“谁啊？”有人问。

“蒋荫恩。”

我一听，知道大事不好，又有人出事了。

文革以后，造反派闹出了不少事。已有好几个老师自杀，包括当过朱德秘书的副校长孙泱。

我挤到西边，只见大家围在15号宿舍门口，从门缝里和窗户往里张望。可是，门窗里面都贴了白纸，什么也看不见。

互相打听，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原来，就在前几天，系里专案组找系副主任蒋荫恩谈话，说他的历史问题严重，还有人揭发他是“国际间谍”，要隔离审查。文革一开始，蒋老师已被打入另册，经常和系主任罗列、总支书记洪一龙、“反动学术权威”甘惜分、方汉奇等接受红卫兵的批斗。有时斗争校一级的领导，他们还得陪绑。

不过，那时候，批斗完了，还允许回家。这回，谈完话，就把他安排在这间空宿舍里，形同禁闭。

那天早上，没人注意他起没起床，中午才发现他半天没露面。专案组的人敲门，也无人应。这才急了。消息传开，系里系外，好多人都跑来了。

没人敢轻举妄动。忙乱一阵后，有人从门上气窗爬进去，开了门。我看见蒋荫恩老师挂在北边窗户的把手上，头歪着，身子还是站立的。人们把他放到地上。下午两点多，警察来了，拍了照。

蒋老师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我大着胆子，进屋看了一眼。老师的脸色有点发黄，舌头堵在唇间，并没有吐出来，颜色已经发紫，眼睛微张，不肯瞑目。我心里一阵阵发紧。

这事该怎么办，好像都不知道，也没人管。蒋老师就这么在地上躺着，忘了是谁，在他脸上盖了一块白色的手帕。

## （二）

这件事，顿时成了南一楼议论的焦点。我回到宿舍，发现屋里多了好几个外系同学。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有个同学看得比较细，说蒋老师是把被单撕开，拧成绳子上吊的。有的同学说，人死不能复活，不管有多大罪过，也不该自杀，家人怎么办啊。

我心里放不下，又出来看看这事究竟怎么了结。突然，一个家伙跑过来，嘴里嚷嚷着，大特务，反革命，死了拉倒！他手里拿着一根绳子，一下子就冲到屋里，把绳子套在蒋老师的脚踝上，打了个结，就使劲往外拉。

干嘛？拉哪儿去？大家都很吃惊，但谁也不敢吱声。牛鬼蛇神、国际间谍，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这些都是现成的词儿，谁敢表示一点同情？

这家伙一边拉，一边继续骂骂咧咧。遗体本来头朝着门，他一拉，就转了个，变成脚朝门了。脚拉出来，腿拉出来，上身也拉出来，再拉，两只胳膊卡在门框上，拉不动了。只见这家伙一使劲，咔嚓一声，一只胳膊折了，整个身体也拉出来了。我真想骂一句“畜生”！但还是没敢。

遗体被拉到中间的楼梯口，这家伙犹豫了一下，自己先下了几级台阶，再一使劲，蒋老师随着被拽下楼。这时候，盖在脸上的那块手帕掉了，老师那颗清癯瘦削的头颅，一颠一颠地磕在台阶上，头朝下被这个王八蛋拉到一楼。

我和几位同学跟着下了楼。蒋老师的衣服已经被拉得卷了起来，露出了肚子，断了的那只胳膊，夸张地张扬着，摇晃着，像是在抗议。蒋老师的身上、脸上全是土和划痕，头发披散着，也沾满了土，惨不忍睹。

谁知事情还没完。这家伙竟拉着尸首一路往操场方向走。他大概是要把蒋老师扔到操场去。

这时候，楼下已聚了不少同学。大家都亲眼看见了这悲惨的一幕。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生前挂黑牌，戴高帽，低头弯腰，游街示众，受尽侮辱，死后遗体还要被丧尽天良的狂徒如此作践，天理何在啊！

我心里正骂着，王八蛋又转回来，把遗体放在楼前，绳子一扔，走了。

蒋老师的遗体，后来被暂时塞在东边楼梯角落那间装扫帚簸箕的小屋里。我似乎记得方汉奇老师也帮助抬过尸体。那间小屋，归方老师分管，因为扫帚簸箕都是他的部属，几间厕所也是他精心照管的领地。过了好长时间，他家里才来人，把尸体运走。

这个罪恶的场面刻骨铭心。49年过去了，只要回忆起这件事，一幕幕恍如昨日。我也不会忘记那个丧心病狂的家伙。但是，非常奇怪，我十分清晰地记得他那些暴虐粗鲁的动作，但却回忆不起这个家伙究竟是谁，脑海里是脖子以下清晰，脖子以上模糊的怪物。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是系里某个年级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那几年，这样的人随处可见，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口号喊得最响，打人出手最重。

是什么样的魔障进入他的心灵，让他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是什么样的“信仰”扭曲了他的理智，让他成为撒旦而不自知？他一定觉得自己特别勇敢、特别正义，是最最纯粹的革命战士，正在以实际行动捍卫心中那轮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吧！

不知道这段历史后来有没有得到清理，也不知这个造反派小头头有没有受到惩处。

### （三）

我们这届70届学生，是文革前最后一届，1965年入学，只念了一年书。我们上面最高的是66届，随后的67届没有招生，下面是68届和69届。我和系里的很多老师都不熟悉，因为没有机会上他们的课。但蒋荫恩老师，我还算熟。



1965年夏天，我刚入学没几天，突然有位戴眼镜的老师到我的宿舍，一进门就问，哪位学生叫张宝林啊？他一口江浙口音，我听着很亲切，因为我是上海考来的。

但是，他怎么会认识我呢。我问他。他说，我叫蒋荫恩，蒋介石的蒋，树荫的荫，恩情的恩。我看过你的试卷，你的字写得很漂亮，小时候练过吧？我喜欢写毛笔字，练过几年，还参加过上海青年宫举办的青少年书法训练班，这些，我都告诉他了。

他对着我和其他几个同学说，把字写好很重要，现在人们不太重视书法，其实这是中国的国宝，要多练。他还说自己也是书法爱好者，以后多交流。

这是我第一次见蒋老师，当时还不知道他是我们系的副主任。他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给我的印象很深。后来，我见到的蒋老师，总是衣着得体，举止端严，说话不紧不慢，有一种贵族气质。

文革中，哪怕是上台挨斗，他也不卑不亢，我从未见过他颓唐的样子。也许，正是这种高雅的气度，洁身自好的秉性，才让他就毅然决然拒绝更加屈辱的“隔离”待遇，宁为玉碎，不作瓦全。

我后来才知道，蒋老师其实大名鼎鼎。

蒋老师生于1910年，浙江慈溪人。早年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1935年毕业后，因成绩优秀留校任教。1936年初到天津《大公报》任编辑，后来还到《大美早报》《大公报》桂林版当过编辑和编辑主任。1942年起，投身新闻教育事业，先后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副教授，教授。

1948年，蒋荫恩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从事研究一年。1949年10月回国，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蒋荫恩先后出任北京大学总务长、校办主任，兼中文系教授。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人民大学新闻系，他任系副主任、教授。

从北大并入人大的部分新闻专业老师，包括方汉奇、甘惜分等知名教授。

蒋老师年轻时是名记者，撰写并翻译过大量新闻、通讯、评论。他还得到过中国报业的宗师张季鸾先生的亲传。他到天津大公报工作的第一天，张季鸾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办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没有信仰和热情，断不能成功。

他回忆上大学时见张季鸾的情景：“百十个青年围坐在燕京大学临湖轩的大厅上，除掉阳光透过树叶射到地板上的一点闪烁外，空气静肃得几乎听到各人的呼吸，大家似乎在等待什么。忽然，门呀的一声，走进一个人，矮小、瘦弱，不使人感觉什么。坐下了，开口了，可不同哪，健谈、渊博、诚恳，而且精神焕发，态度闲逸。五十几分钟的话，大家听完了还想听。可是，门呀的一声，这位矮小、瘦弱的人，又走出去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季鸾先生。从此，他的神逸、潇洒的风度，精邃风趣的谈话，就深深地刻画在我印象上了。”

一个成功的报人，为了培养后进，毅然投身新闻教育事业，除了行政管理工作，他教过新闻理论、报纸编辑、新闻采访与写作、广告学等许多课程，可谓新闻领域的全才。他培养的学生，许多成为名编辑、名记者。可是，在新闻系，蒋老师却从不张扬，许多学生甚至不知他这段历史。

文革后，蒋老师获得平反。他的名字列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新闻事业的后继者，不会忘记这位先驱，不会忘记这位殉道者。

2017年2月18日

〔作者简介：张宝林，1947年出生，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0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78年），文学硕士。〕

~~~~~

【往事非烟】

红卫兵打死人之后

• 乔晞华 •

这是《明镜历史网》主持人高伐林先生对文革研究学者乔晞华博士在2017年2月21日做的采访。

高：你为什么写《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您当时是当事人、目击者吗？您是从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着手调查？

乔：我写《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一书的第一个原因与王金事件有关。我们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在文革初期打死了一个无辜的工人。虽然我们并没有参与打人，但是我们作为该校的学生有义务也有责任向社会表示我们的歉意。不少同学曾议论过公开道歉之事，但是存在不同意见。我决定以写书的形式代表部分同学向社会做个交代。我的行动得到了不少同学的支持。

关于目击者的问题。我没有在打人现场。当时打人还是要有资格的，需要是红卫兵。但是打死人以后，学校发生的事，如工人抗议等等，我是目击者。我很早就酝酿写这一事件，但是一直苦于没有具体的材料。2013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联系到一位同学，他告诉我说看到过调查报告，后来帮我找到，这样我就有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材料。我也通过电话向同学打听，有些同学还是愿意与我谈这一事件的，所以知道了一些内情。随着书的发表，有更多的同学向我提供一些情况。

我介绍一下南京外国语学校的情况。这所学校常简称为“南外”，是1963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提议建立的首批外国语学校之一。南外走出过众多的外交官，包括大使、外交部发言人等，培养出多位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它的毕业生常被国外大学以全额奖学金直接录取，学校的校友有许多是博士、教授和学者。这所学校是南京市和江苏省的重点学校。

南外刚开办时，分别从二年级学生、小学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中招生。我是65年小学毕业考入南外的。我的妻子比我低三个年级，但是她进南外却比我早一年，比我的资格老。因为她三年级起就开始在南外上学了。自1982年起南外改为只从小学毕业生中招生。初建时学校设有英、德、法三个语种，1982年起增设了日语专业。

南京外国语学校地处市中心不远，学生一律住校，即使学生的家与学校仅一墙之隔也不例外。学校的办学目的是为国家培养高水准的外语人材打好基础。当时的南外和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简称南师附中）是江苏南京地区地方权贵子弟云集的学校。

高：请介绍一下“南外王金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乔：南外的历史上有最黑暗的一页，这就是1966年9月29日，南外的31位红卫兵无故打死了南京市玄武区建筑联社第三工程队的工人王金先生。当时，学校改名叫做南京国际共产主义战校。学校里有两个红卫兵组织，都是由干部子弟组成，一个叫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他们是多数派。另一个叫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他们是少数派。两者的区别是，主义兵的家庭出身不如思想兵过硬。记得当时思想兵要求其成员必须来自1945年抗战胜利前参加革命的家庭。我虽然不属于黑五类，但不属于革命干部子弟，所以没能加入成。

由于大多数当事人还健在，考虑到个人隐私，我今天在这里用代号来提及当事人，就不指名道姓。事发前，南外“思想兵”的许多骨干成员外出串联去了，留下初三法班的第1号红卫兵和初三英班的第2号红卫兵分别作为“思想兵”的第一和第二临时负责人。因为他们是思想兵的勤务组成员。南外的几位女“思想兵”在闹市区撒传单，哄抢传单的市民趁乱欺负了她们。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性骚扰了她们。女生们回校后向男生哭诉了受辱经过。“思想兵”的男生被激怒了，决定以后派男生在后面跟踪保护。

9月27日，几位女“思想兵”沿街散发传单。负责跟踪保护的男生发现了两个行迹可疑的人，其中一人是王金。王金拣了一张传单以后，跟着又拣了两张。王金被怀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梳着西式发型，穿一双擦得雪亮的皮鞋，被认为不是流氓就是阿飞。王金与妻子的关系不是太好，所以下了班以后常常在街上遛达。那一天，他看到有人撒传单，就跟在红卫兵后面多拣了两张。第16号红卫兵等5位“思想兵”上前盘问王金，并叫了两辆三轮车，把王金押回学校。途中巧遇王金所在单位的指导员。指导员向红卫兵证实王金是工人，并且作了担保，王金被暂时释放。

“思想兵”当天还抓了一个工人叫叶家复。晚上，看守大意睡着了。叶家复翻墙逃跑了。因为叶家复没有留下真实姓名，第二天“思想兵”找不到他，怀疑王金与他是一伙的，就把王金从单位带回学校关了起来。王金曾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是个中尉药剂师，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过。解放后，王金曾在徐州的一家医院任药剂师，因配错药造成一名工人死亡被判了刑。刑满释放后，他回到南京。

当天下午，由第2号红卫兵和一名“思想兵”对王金进行了审讯。审讯中，王金说不认识前一天晚上逃跑的人。当问到是否有历史问题时，王金老老实实交了自己的问题。第二次审问是在4时左右，参加的人较多，主要是重复第一次审问的内容。审问中，第19号红卫兵用鞭子抽了王金的脚，但受到第15号红卫兵的劝阻，理由是“等问清楚再狠狠地打他一顿”。“思想兵”的父母大多是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的共产党人。眼前的王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这还了得。“思想兵”出了一道算术题，问他在战场上救治了多少国民党兵，被他救治的国民党兵又杀害了多少解放军。王金回答不了，挨了打。

一位有同情心的高三德班的姓杨的同学试图阻止殴打王金的暴行，但是没有能够成功。这位同学是位平民子弟，正直敢言，后来成为一名优秀的检察官。近年来，我与这位同学取得了联系。他向我讲述了他劝阻打人凶手时的真实想法。他说，“我以为我是学生中最大的，文革前这些初中的同学都很听话，学外语时在操场上跟着我们早读，下午体育课锻炼时

一起打球跑步，晚上回到宿舍他们睡下铺我们睡上铺，何等亲密无间。”可惜他没能阻止成功，这些在他眼里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变得不听话了。

晚上，第1号红卫兵从外面抄家回来，决定亲自审问。他们把已经一天颗粒未进的王金从楼梯间里拖出来。问了几句以后，第1号红卫兵不耐烦地从第2号红卫兵手中夺过铁条，猛抽了王金两下，接着第2号、第4号、第20号、第5号红卫兵等一拥而上，将王金毒打了一顿。王金被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鲜血溅到了墙壁上。一名女生被吓哭了，逃出了审讯室。事后，她写了检讨书，承认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对阶级敌人存有同情心。这是我当年听同学说的，我记得非常清楚，有名有姓。但是经过50年后，我无法找到人证实此事，大家都说不记得了。

王金被放回楼梯间里无人过问，饥饿难忍，向红卫兵要吃的。红卫兵的管理混乱，没有专门的看管人员和机构。红卫兵的吃饭问题是自己负责的，谁也不会自掏饭票为王金买吃的。有一位“思想兵”给王金喂了一勺子贴大字报的浆糊。当时的浆糊很简单，就是用面粉放上水烧一下做成，所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可以吃。现在已经没有人用这种浆糊了。

晚10时左右，王金又被拉出来。第1号红卫兵首先对王金的太阳穴猛击两拳。接着第7号红卫兵用木棍狠捣王金的腹部四、五下，打断了三根体操棒，而第6号红卫兵的体操棒在毒打王金时断为三截。当时的体操棒是木质的，长约有50厘米，2—3厘米。第15号红卫兵把皮带蘸水狠抽王金。王金曾苦苦哀求，没有引起他们的同情。当时有人听到王金说，“不能这样打，不能这样打。”王金有五、六次昏厥了过去，他们用冷水泼醒过来继续打。拷打一直持续到午夜。王金被关回楼梯间时已经奄奄一息。

9月29日上午7时许，一位小五英班的男生到学校去玩，看到王金躺在楼梯间的地上。王金向这位同学要水喝。他对王金说，“地上不是有水吗？”离王金不远处有一只碗，里面盛着水。王金答道，那是生水，不能喝。曾是药剂师的王金此时脑子还是清醒的，知道没有烧开的自来水不能喝。由于这位同学不住校，没法帮王金找到开水就离开了。

9月29日上午8时，第3号、第7号、第10号、第5号和第6号红卫兵等叫王金出来，王金已经瘫在血泊中爬不起来了，他们又打了一阵。这次殴打，第3号打得较狠，所以他后来为此付出了代价，被抓了起。10时左右，第16号红卫兵才想起要给王金吃点东西，可是王金已经四肢僵硬、瞳孔无光。校医赶来给王金打了强心针，但是未能救活王金。

思想兵立即采取措施，封闭了学校大门，任何人不准进出。没多久，学校大门口、教学楼的墙面上和树上，陆陆续续的贴出了“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

晚上很晚时刻，校门才重新打开，人们可以离开学校。吴玉璋老师和凌介平老师被叫去抬王金的尸体。一位女红卫兵高举着带血的鞭子，冲吴老师吼道，“你不老实，王金就是你的下场！”吴老师当时被斗得很厉害。她后来走上领导岗位，接触到了当年造反派搞的调查报告，悄悄地收藏了一份，辗转到了我的手中，使得王金事件真相能在50年后重见天日。“思想兵”开了介绍信，把王金用救护车送到火葬场。火葬场的工人看到死者遍体鳞伤，感觉到有问题，坚持要公安局介入，明确死因，红卫兵才不得不通知了公安局。公安局派出的便衣警察赶到南外。警察和打人的红卫兵握手言欢，并且看了行凶器械，传授多长的鞭子最合手，还夸奖第15号红卫兵的鞭子编得好。

高：打死王金引起了社会什么样的不同反应？

乔：打死了人以后，南外的思想兵还是有点紧张的。几个红卫兵围着一位从北京来的红卫兵。这位北京红卫兵身穿草绿色军装，天不冷，却戴着一顶以前只有首长才配戴的呢料绿色军帽，一看就知道是高干子弟。此人慢条斯理的说：“打死一个反革命，黑五类，在北京算不上一回事儿，多着呢。”他的话无疑给南外的思想兵们服了镇定剂。

王金的死讯传到了王金的单位。王金的同事们愤怒了。王金曾经为建造南外辛勤地劳动过。王金被打死在宿舍楼里，而这座楼正是王金和他的工友们建造的。10月2日，玄建联社的工人们首先贴出了“强烈抗议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打死工人一事”的大字报。10月3日，王金的3位同事与华东水利学院（现在叫河海大学）的7位学生成立了调查小组赴南外进行调查。王金之死震惊全城。许多群众开始自发地到玄建联社三队表示声援。

14日，王金的同事和南京大学的红卫兵发起成立联合调查组。16日，一个群众性的草根组织“9·28王金事件联合调查团”（简称“9·28调查团”）在南京大学正式成立。该调查团由南京玄建联社，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南京电子管厂和南京大学等40多个单位的工人和学生组成，其主要成员有王金的同事查全华等人。上海工总司是公认的中国第一个市级跨行业的工人造反组织。但是9·28调查团的成立比上海工总司早了整整24天。

为什么叫9·28南外王金事件，不叫9·29或9·27？我也向同学问过。似乎没有统一的意见。一种解释是，第二次抓才是致命的。所以在我的书发表以前，有些同学也记不清王金是哪天被打死，都以为是9·28日。具体原因，我不能确定。

9·28调查团成立以后，立即兵分多路同时出击。他们派人四处请愿告状，在本市和周围城市大造舆论，组织集会抗议红卫兵的暴行。工人们起初在南外校门口抗议，以后冲破校门涌进学校并占领了礼堂，召开辩论会要求惩办凶手。有的工人们站在教学楼下，扬言凶手不受惩罚就拆掉大楼为王金报仇。我当时就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

在一片愤怒声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在辩论会上，工人高呼口号，要求惩办凶手。一位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反驳道，“难道要用我们红卫兵的鲜血去抵偿一个社会上小混混的血？”众多的工人竟无以言对。他的反驳引来台下红卫兵的一阵掌声。工人们一时语塞。这说明血统论在当时还很有市场。王金被打死的第二天，南外的一位老师贴出了大字报，题为“某某某（指第一号红卫兵）是个好孩子”。一些参加打人的“思想兵”家长对死人事件不以为然，认为“打死个把人有什么关系”，“反正市委要替我们顶住”。有位家长坚决反对第1号红卫兵写检讨。市委不得不告诫这些家长“不要再火上加油”。南京第9中和第10中的红卫兵开始串联，说打死王金是革命行动，还说北京打死的人多着呢。

北京的红卫兵打死上千人，暴行没有受到谴责，没有引起社会反弹。为什么王金之死在南京却成为轰动事件？为什么南京的市民对红卫兵的暴行敢说“不”字？文革开始后，在王金之前，南京也发生过打死人事件。如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的党委副书记李敬仪，8月5日省教育厅长吴天石，9月5日南京第13中学图书馆员韩康被学生斗争、殴打致死。但是，他们的死并未引发南京市民

高：为什么王金的同事和市民敢于抗争请愿？

乔：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政治大气候已经发生了变化。著名学者胡平给我的书写了个书评，网上可以查得到。他在书评中说，卞仲耘案件发生在1966年8月初。老红卫兵倚仗血统高贵，骄横不可一世。毛中央对他们支持放纵，没人敢正面反对。王金事件发生在同年的9

月29日。虽然在时间上只相差50多天，老红卫兵已是强弩之末，由于失去了中央的支持而开始走下坡路，造反派已经开始得势。后来王金事件的另一个受害者叶家复参加了造反派。造反派得势后，叶家复带领一队工人来到学校企图找当年打他的红卫兵算账。

更重要的原因是王金所在的单位政治成分复杂，90%以上的工人或多或少地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或现行问题。历史问题指的是曾经参加过国民党或国民党军队成员，曾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等。一个拥有200多人的工程队因党员数量不足3人竟无法成立党支部，只好派一名党员任指导员。也就是说，只要是党员，在那个单位里就可以当官。

这里的工人尽管也被称为工人，但是他们与国营大型企业里的工人有着天壤之别。他们属于边缘化的群体，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低下，为社会所歧视。单位里有许多像王金那样具有历史问题的工人。对于南外的红卫兵来说，他们的“不幸”（打引号的不幸）是打错了人。如果他们打死的是本校的老师，打人事件肯定不了了之。可是他们打的是王金。他所在单位充满了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这是一只“马蜂窝”。南外的红卫兵打死王金无疑是捅了马蜂窝。

高：当局如何表态？出于什么考虑决定缉拿红卫兵为首凶手？

乔：当局为平息民愤费了不少心思。王金被打死当天，玄武区委立即召开由多方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决定把尸体迅速处理掉，免得工人抬尸体上街。10月6日，第1号红卫兵递交了检讨书，承认自己犯有错误，骄傲自满，但坚持认为打死王金事件是好人打坏人。省委书记许家屯公开称赞检讨，认为打死王金属于误伤，红卫兵不必为此受到法律制裁。同时成千上万奉省市之命的“正面”大字报出现在大街小巷，宣称打死人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必法办，只要认识就行了。

10月8日晚，民众在南京的鼓楼广场集会，号称十万人，扬言要踏平南外。市委立即派出10多辆接待外宾用的大轿车，把仍在学校里的南外学生秘密护送到与安徽交界的僻远乡间。10月11日晚，市委送第1号红卫兵乘飞机前往山东老家避风。我和我们班的同学因为年纪小，在老师的劝说下，于10月8日前已经逃回家中。后来愤怒的民众砸了学校，不仅公物损失挺大，我们的个人物品也丢失不少。

当局认为“死者家属不起来闹，事情就好办了”。他们采取加速处理、稳住一头的方针，派出女工一天24小时地看住王金的家属，防止与外界接触。他们还通过房管所换房子，把王金的家属搬了家。搬家后房租比过去的房租高了3元，差额由政府补贴。在抚恤上，对王金的家属格外照顾，每月给王金的养母和养子生活费各30元，养母到去世，养子到16周岁。王金出生仅六个月就失去了父母，是由养父母抚养长大的。后来王金与养父母家的女儿结婚，所以养父母也是他的岳父母。王金的家属享受国营工厂的劳保待遇，大大超过王金所在的集体单位的标准，甚至超过了国营企业和国家干部的抚恤标准。

这样的处理确实起到了稳定死者家属的作用。王金的家属自始至终没有在公众场合出现过，没有公开为王金鸣冤叫屈，为死者讨公道。从家庭的角度上说，王金是可悲的。但是王金又是幸运的。他的同事们冒着自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的风险，为他奔走呼号在南京甚至在江苏掀起了轩然大波。

1966年12月30日，市政府在民众的巨大压力下决定缉拿凶手。当局为什么终于出面抓红卫兵呢，这也是为了自保。当时调查团把矛头指向省市委，声称他们才是真正的凶手。如果当局再不抓人，他们就有倒台的危险。

参与殴打的“思想兵”共有31人。其中1人是高二的学生，初三的有9人，初二的有13人，初一的有8人，与我同班的有4人。打人凶手中年龄最小的是13岁，最大的是18岁，大多是15、16岁的孩子。凶手中有6名女生。2人是工人子弟，4位学生家庭出身不明，其余的25人都是干部子弟或军队干部子弟。除了南外的红卫兵外，还有北京和上海的一些红卫兵，王金死后这些红卫兵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市委决定逮捕三个人：第1号、第2号和第3号红卫兵。第1号红卫兵的父亲是南京军区后勤部的少将副部长，是位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在逮捕凶手的公审会上，第1号红卫兵的父亲公开表态，表示儿子犯了法应该受到惩罚，支持有关部门的决定，决不包庇纵容自己的孩子。他的诚恳态度对平息民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1号红卫兵的父亲在单位口碑相当不错，是位受人尊敬的将军和长者。

高：这几个红卫兵是什么样的人？平时表现与特殊时期的表现形成强烈反差，为什么？

乔：平心而论，第1号和第2号红卫兵为人挺好，我都认识。他们在南外师生中口碑甚佳。尤其是第1号红卫兵，虽然其父身居高官，从不盛气凌人，平时尊重老师，与同学相处和睦，学习成绩也很好，在同学中颇有威信。第1号红卫兵被捕后，他的老师不顾自己还在受审查的处境，不止一次地呼吁要求释放第1号红卫兵。我的妻子与第一号红卫兵是小学同学，对他的印象极好。她告诉我，第一号红卫兵在学校里一直表现很好，被学校树为标兵，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为什么人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前很正常的人在文革中突然表现得很暴力？这个问题也是我的书中论及的另一个课题，简单地说，人在恶劣的环境下，会做出平时不会做的恶事。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里不能展开谈了。

高：这一事件如何平息？

乔：5个月后，“9·28调查团”完成了对王金之死的调查，向社会公布了调查结果。这是一份详细的报告，共有50页，包括王金被打死的经过，王金的个人简历，参与打死王金的学生名单，法医鉴定和刑事摄影，市委书记处会议记录摘要和省市委主要领导人的报告，玄建联社三队造反派的批判文章，南外部分学生的批判文章，南京市委和玄武区委工作人员于顺良、张国义、徐俊良和孙勋的揭发批判，工人批判省市委的大字报，南京市委对处理王金事件的检讨，以及王金事件大事记。

“9·28调查团”于1967年2月6日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关于王金事件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批判大会”。省市委负责人（如省委书记彭冲、市委书记王楚滨、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忠等）被揪斗。副市长王昭铨代表市委作了检讨。

高：打人凶手与调查人员后来的命运如何？

乔：王金事件的最终结局。第1号、第2号和第3号红卫兵被拘留了近2年，于1968年10月工宣队进校后，由工宣队把他们从监狱里领回南外。他们三人下了乡。后来第1号红卫兵通过父亲的关系参了军，在南京军区的装甲兵部队服役。由于监禁精神遭受打击，第1号红卫兵得了忧郁症，变得沉默寡言、行动迟缓，无法适应部队的紧张生活。他后来进入大学学医，毕业后在南京一家医院检验科任技师直至退休。第2号红卫兵后来去了江苏的镇江，退休以后曾在南京开过一家餐馆。第3号红卫兵被释放后也参了军，成了一名工兵。他酷爱唱歌，在服役期间参加了当时流行的样板戏的演出。为了增强舞台效果，他参与了舞台爆炸火药的制作。不幸的是，火药发生意外爆炸。他的双眼被炸瞎，双手只剩下三根指头，

成了特等残废军人，住进了荣誉军人院。参与打死王金的其他人多数参了军，退出现役后均获得稳定的工作，有不少人仕途发展顺利。他们中有的成了大学教授或专业人士，有的成了国家机关、事业或企业单位的干部，也有的下海经商成为商人。

相对于打人凶手，“9·28调查团”的成员远没有那么幸运。最悲惨的是查全华。查曾是南京第24中学的学生，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1963年初，查全华和同学成立了一个秘密社团，出版了一份地下刊物。查全华报考军大护士班政审不合格未能遂愿后，弃高考报名参军入伍。新兵集训结束时，查全华被连队领导相中，成为连队文书。但因曾办过地下刊物，他被提前退伍，沦为内控人员。王金事件发生后，查全华发起成立了“9·28调查团”。他两次赴南京娃娃桥看守所提审被收押的第1号红卫兵。后来，查全华因言获罪，于1969年12月15日被南京市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与查全华素不相识却为之鸣不平的下乡知识青年陈卓然不畏强暴，决心抗争。他和另一名知青苏小彬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拼合成六条标语，趁夜色贴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标语的主要内容有：“查全华烈士永垂不朽！”“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后来陈卓然被知情者告发，也被判处死刑。虽然两案最终得到平反，但是人已经被冤杀不能死而复生。

“9·28调查团”中玄建联社的工人成员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等运动中均遭受厄运、倍受迫害。有的人从此心灰意冷再也不介入群众运动。有的人仍不甘心，在后来的几次民主运动中有所表现，但是终不能成气候。由于企业改制，他们的生活受到影响，很多人在贫困中度日。他们的大多数人已经谢世。

高：这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在文革中是否有普遍意义？

乔：文革中“9·28调查团”与当局的抗争是一次不对称的博弈，是一次先胜后负的博弈。王金之死平平无奇，文革中比他惨死的人有成千上万。然而使王金事件可圈可点的是王金死后发生的事情。王金之死引发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导致三名红卫兵被抓。“9·28调查团”对历史做出的贡献不仅仅是弄清楚王金之死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对南京市乃至江苏省的红卫兵暴力起到了抑制作用，使许多无辜百姓得以逃脱厄运。

南外王金事件的凶手当时就受到处理，在文革中是绝无仅有的，并不具备普遍性。这是因为当时的大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如前面说的，“老红卫兵已是强弩之末。”老红卫兵失去了中共上层的支持。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王金的工友。他们处在社会底层，受压迫受歧视，是边缘化的人物。是他们的造反行为促成了三名凶手的被抓。

高：您的著作出版之后引起什么样的反响？

乔：我于2015年12月发表了《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一书（简称《王金事件》一书）。2016年初，我利用电邮和微信平台以新年问候的形式，向原南外的近90位师生发出了一封题为“关于《王金事件》一书的几点说明”的邮件，介绍了我写书的目的，并附了书的简介、前言、结束语、目录和封面图。由于该书仅限于港台地区发行，我设法向国内外的同学和朋友寄去或带去了数十本，供他们传阅。后来有同学用扫描的方法把重要内容放在朋友圈内传阅。不少人在得到我的赠书前已经看到扫描版的内容。

《王金事件》一书的发表在南外同学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消息传得很快。我的一位同学加朋友母子俩都是南外的学生。她是从她儿子那儿得知我的书的。说明新生代对此事也挺

关心。书中涉事红卫兵的名单成为关注的焦点。对于我的书，赞扬支持者有之，谴责者、说我用心不良者有之，不发表意见保持沉默者也有之。而涉事同学的反应更强烈一些。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当同学们收到我寄去或带去的书，发现我在书中对涉事人员的名字进行了适当的处理以后，反弹小了许多。如果采用实名，反弹肯定更大。我主张揭露文革真相，采用匿名的方式。这就是我力主的“南外匿名模式”，做到对事不对人。按西方人的说法，恨罪恶，爱罪人。

有一点遗憾的是，南外至今还未出现像陈小鲁和宋彬彬那样能够出面主动道歉的人物。我想促成，但未能成功。

高：如何评价这一事件？

乔：王金事件涉及到我们如何来评价南京持续五个月的抗议运动，进而涉及到我们如何评价文革中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再进一步涉及到如何定义文革。对于如何定义文革，华人学界中存在着“一个文革说”和“两个文革说”两大学派。人们常称之为“一个文革”和“两个文革”之争。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把文革定义为“内乱”。把历史的一个时期说成是“乱”，一般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例如中国历史上有“安史之乱”，“八王之乱”。凡是出现乱要么统治者出兵平定乱，要么统治者被推翻下台。所以定义文革为内乱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缺乏中立性和客观性。鉴于这一原因，国内有学者提出了文革是一场特殊的政治运动的说法。这就是“一个文革说”。

中共的《历史决议》和“一个文革说”存在一个问题：群众运动和造反派成为文革错误的替罪羊。按照他们的观点，文革的错误和罪恶上层由林彪四人帮负责，下层由造反派负责。有的受害者回忆文革时，把在文革初期受的伤害，把在军管时期，甚至文革后期受的伤害全算在造反派头上。如有的人说红八月时期被造反派打了，还有的人说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时被造反派整了。其实那时造反派要么还未出世，要么早就解散了。他们在那时受的罪与造反派没有一点关系。虽然有的原造反派个人参与了由军管会或革委会领导下的整人运动，但是这些整人错误或罪责与造反派无关。因为此时造反组织已经解散了。整人的账要算在军管会和革委会头上。

为了撇清对造反派的妖魔化，也有学者提出了在“党的文革”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人民文革”的说法。这就是“两个文革说”。该学说的目的是力图使人们明白，文革后七年的镇压群众的账不能算到造反派头上。

高：这一个案如何引出对文革本质的认识，我们将再安排节目来探讨。

~~~~~

##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八）

• 王复兴 •

（上接 z k 1 7 0 2 d，第六章 继续大乱的 1 9 6 8 年）

#### 4、散步遇刺，有惊无险

3月初，北大两派都在准备武斗，时有小冲突。3月24日前，“井冈山”占领了28楼等楼，每占一楼便出动武斗队，把“公社”一派学生赶到楼外，把他们的被褥、衣物扔出窗外。“公社”占领了44楼（招待所）等楼。两派都组织了武斗队，武斗队个个头戴柳条帽、手持丈二长矛。长矛是用铁管截成，一头磨尖，锋利无比，是可至人死命的武器。我那时极其反感武斗，反对武斗，但又无力制止，只好当了逍遥派。当时“公社文攻作战部”和“新北大人写作组”的一批人，都成了逍遥派。

3月中的一天，黄虹坚告诉我，历史系有个“井冈山”的男生叫杨树生对她一向很友好，对她讲“你千万要小心，‘井冈山’有人很注意你。有人要揍你！”黄虹坚猜测“井冈山”武斗队可能有个打人的“黑名单”，让我也小心。黄的猜测不知真假，但当时的火药味已是一天比一天浓。

3月20日左右的一天傍晚，晚饭后我从大饭厅通往南校门由北向南的路上散步，突然听到身后有紧凑的脚步声，回头一望，有两个手拿长矛、戴柳条帽的人在后面10米远正加紧脚步追我，似乎认识我。我感到不妙，撒腿就跑。两人立马紧跑追我。我突然感到后背如针刺一般被刺了一下，赶紧左拐跑进27楼，那两个人这才停止追逐。我跑到黄虹坚宿舍，述说了刚刚发生的惊险一幕，在她那儿躲了半个小时。而后跑回38楼宿舍，王渊涛、陈双基正好在，我脱下外套、秋衣，让他们看我后背怎么了。他们告诉我，在我后背脊椎（后胸）的正中部位，有个小红点，皮肤被刺破了一点点。好险！陈双基说，幸亏你是田径运动员跑得快。当时两派的控制区域尚不分明，我遇刺的那条路，那时属于中间地带。追击我的那两个人可能是从28楼“井冈山”总部出来，巡逻到三角地带，向东拐再走上我那条由北向南，面向南校门的路。此事很令我后怕，差一寸我就完了。在最高学府里的大学生竟然会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凶手，文革中的阶级斗争把人性扭曲成了这个样子。我的遇险告诉我，北大武斗两派没有什么对错之分，没有正义的一方，双方都错，都犯了反社会、反人性之错。

当时两派参加武斗的积极分子，分别只占两派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左右，两派绝大部分师生厌恶武斗，拒绝武斗，成为逍遥派，许多人都回家了。大部分人以逍遥方式抵制武斗。这绝大多数的两派逍遥派群众代表着比较正义的方面及正确的方向。两派的武斗队仅各有六、七百人，“公社”一派参加武斗的人略多一点。这个数字从后来工宣队进驻北大，两派上交的武斗工具，可以测算出个大概。两派都被少数激进派所控制，广大群众无可奈何。毛泽东的文革已经失控。毛泽东对这种局面也没办法，于是撒手不管，他在等待，等待清华、北大胡闹够了，烂透了，再出来收拾残局，转弯，重建中共的党国秩序。

#### 5、武斗升级

3月26日前，北大两派武斗局面已经形成，但尚未发生大的武斗事件。有些回忆文章，认为北大武斗扩大、升级是在3月29日，在我的记忆中此说法不够准确，应是在25、26号两天。

3月25日下午，地院“东方红”等七个高等院校“地派”的学生近万人，人人手持铁棍，从北大各校门涌进校园，与北大“井冈山”武斗队汇合，要挑起大规模武斗。“新北大公社师生”见状，纷纷加筑工事，准备一战。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她得到情报，即将在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后台是支持“地派”的谢富治。目的是一旦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出现人员伤亡，就可以把罪名扣到聂元梓头上，从而拔掉聂元梓这颗“钉子”。聂元梓得知紧急状态后，立即赶往市革委会面见谢富治，强烈要求谢富治到北大制止武斗发生，否则有

事谢须负责。谢只好随聂在傍晚赶到北大。谢富治到北大广播台，在大喇叭里讲：“外校学生都离开北大，回自己学校去。北大师生在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领导下闹革命。”聂说谢富治讲完话以后“外校学生呼拉一下子全走了。”（注5）对以上聂元梓描述的3月25日下午的紧急事态，我竟浑然不知，那时自己做为一个逍遥派，每天上午钻图书馆看书，下午去颐和园游泳。我只依稀记得谢副总理那天傍晚在北大广播台讲过话。但对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大清楚。文革后为了搞清楚25日这天下午发生了什么，我查阅了当年地院“东方红”的头头之一、王大宾的助手聂树人写的文革回忆录《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其中第12章提到聂元梓所说1968年3月25日下午七院校学生到北大搞武斗一事。聂树人否认有此事，说这是聂元梓“编造”的“假话”。为考证此事真伪，我查看了孙月才公开发表的《文革十年日记》（出版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存有孙月才日记的影印件。）该日记第298页1968年3月25日星期一这一天记载了：“下午形势紧张，井冈山联合外校、农大东方红、新人大公社，准备对我新北大公社搞大规模打、砸、抢。新人大、农大东方红进校了，并打伤了我们不少人。新北大公社为了自卫，大运石头，筑工事，空气紧张异常。晚7点左右，谢副总理、吴德同志、丁国钰同志亲临北大广播台作重要广播讲话。谢副总理指出：一、希望北大的两派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在聂元梓领导下联合起来。二、‘打倒聂元梓’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三、外地、外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是错误的。”孙月才是“新北大公社”负责人，他当年当天所记的日记，可信性不容置疑。孙月才提到25号下午来北大武斗的外校，只提到二个：农大东方红、新人大公社。而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是七个学校，其中有地院东方红。聂树人说他不知道此事。那么25号到北大来武斗的外校有没有地院东方红，这是应可存疑的一个问题。但25号下午确实有大批外校后来被称为地派的学生涌入北大，支持北大“井冈山”，企图挑起大规模武斗，是确有其事。否则谢副总理便不会在当晚的北大广播讲话中的第三条说“外地、外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是错误的。”将来研究北大文革史的人，可以去查谢的这个讲话，在北京市政府的历史档案中应可查到。聂元梓指控此事件有着很大、很深的背景与内幕。这需要将来研究北大文革史的人去深入调查研究。

关于3月25日所发生之事，《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在1968年3月25日这一日期的条目下，有以下三段记载：

3月25日：“地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造反组织近万人聚集北大，进行反聂、孙游行，并发生武斗。同日，地院、农大、北邮等院校红卫兵开广播车到北大校内宣传，声援北大“井冈山兵团”。晚，谢富治、吴德、丁国钰赶到北大讲话，制止武斗，要求“所有外校外地学生一律退出北京大学。”说：“到北大来武斗是错误的。”

以上《纪事》对3月25日的三段记载，与孙月才的《日记》（注6）及《聂元梓回忆录》的回忆大体一致。聂元梓曾在文革后的法庭审讯时，指控这是有高层人士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一场由校外到北大校内的大规模武斗。幸而在聂元梓强烈要求下，谢富治及时赶到北大化解了危机。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谈到在法庭预审时，她详细申辩了不是她挑起武斗，而是在1968年3月25日谢富治策动地派万人到北大支持北大“井冈山”，要挑起大规模武斗，而她逼迫谢富治到北大制止了大武斗。为此预审进行不下去，进行调查。而后一位姓陈的预审员告诉聂：“在制止武斗的问题上，你是立了一功的，你给党中央写一个关于制止武斗的情况报告吧。”（注7）这样，聂向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陈预审员。迟早有一天，以上这些资料会被全部解密的。

到3月25日晚9时，北大回归风平浪静。一场大规模武斗被制止。25号下午，北大没有发生大型武斗冲突，没有发生攻楼事件，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因此人们可以批评“井冈山”企图借用外力挑起大规模武斗。但只是企图而已，并没有真正发生。校文革、“公社”

总部该收手时不收手，反而要出手。25号深夜和26号，孙蓬一控制的“公社”武斗队主动出击，攻打井冈山，真正挑起了武斗升级。25号深夜，王G·带领“钢一连”攻打“井冈山”广播站。此事被本派的马云龙看见，他无法制止。三天之后马云龙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大字报，声明反对校文革、公社总部挑起武斗，声明辞去“公社”驻“首都红代会”代表身份，声明退出“新北大公社”，以示抗议。马云龙对我讲，“‘钢一连’胡来，孙蓬一昏了头。武斗会死人的，他才不会去替校文革背黑锅呢。”3月26日，“钢一连”在王G·带领下，占领了29楼，把楼里“井冈山”一派的学生都赶走了。我、索世晖、陈双基、任瑚琏听到消息都不约而同赶到“公社作战部”。此时“作战部”已成为“不作战部”、“拒绝武斗部”。索世晖一见我面就破口大骂孙蓬一，说他扩大武斗，是“胡闹”、“混蛋”。大家交流了消息，交换了看法，认为孙蓬一挑起武斗升级是绝对错误。但很无奈，“作战部”决定不参加武斗，反对两派扩大、升级武斗。

3月29日，“公社”武斗队占领了化学系宿舍31楼，把“井冈山”一派的学生驱赶出31楼。

3月29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到北大视察，制止武斗，聂元梓陪同。他们走到28楼“井冈山”总部楼下时，迎面走来3、4个“井冈山”的人，动手就打。李钟奇的头部被打了一个大包。有人用刀子划伤聂元梓的头部，血流了一脸，染红了上衣。后经检查、包扎，只是皮外伤。

3月30日起几天时间，“井冈山”武斗队占领了35楼、37楼。我住的38楼仍是两派混住，但已不安全。于是在4月初，我们“红梅”五人就搬到了31楼住。一天晚上，在31楼楼道里，我看到来视察的孙蓬一，他一左一右站着两个人，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一个是丁J·H·，一个是宫X·Z·。过了几天碰见“公社”总部的李文，他告诉我，丁、宫二人被火线提拔进入“公社”总部，丁任武斗西线总指挥、宫任武斗东线总指挥。我当时意识到，强硬派孙蓬一已掌控了校文革、“公社”总部的实权，而力主两派联合、反对武斗的李文，在“公社”总部已失去话语权。

4月中旬，北大、清华的武斗已在北京闹得满城风雨。一天，姐姐王瑞、妹妹王丹娜两人在城里听说北大发生大武斗，担心我，骑车到北大找我，让我回家。姐姐那时正怀孕，挺着大肚子来找我。我告诉她们我住的31楼挺安全，没事。姐姐回家后流产了。

4月24日之前，“井冈山”除了早已占据的28楼之外，又陆续占据了30、32、35、37楼。每占一个楼，手持长矛的武斗队便逼迫“公社”一派的学生搬走，把他们的衣、物、行李、被褥扔出门外。公社除了早已占据的44楼（学校招待所）之外，又陆续占据了29、31、34，稍后占据了40楼，粗暴地把“井冈山”一派群众赶走（不包括44楼）。

4月25日，“井冈山”又占据了36楼。26日，孙蓬一不顾校文革内高云鹏等人的反对，决定“公社”反攻36楼。结果发生了一场攻楼和保楼的武斗，双方石矢如雨，双方有不少人受伤。由于“公社”是仰攻二楼，受伤较多，“公社”攻楼失败。我当时站在38楼下，是现场观众。当时“井冈山”有种武器叫“大弹弓”，用三根近一米长的铁管焊接成“丫”形，用自行车内胎制成拉弓，在二、三楼窗口固定，用大过拳头的石头当子弹，强力发射可打出一、二百米远。一天“公社”的一同学在38楼下打水路过，从36楼飞来一石，打中脸部，满脸开花，打掉两牙，血染衣裳。“公社”文艺演出队“胜利团”舞蹈队的演员、女生黄蕾，也被“井冈山”的大弹弓打中脸部，脸上眼下位置留下了一个疤。黄蕾说：“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这石头不知是那个混蛋打的，偏往女生脸上打。

4月27日，“公社”武斗队又占据24、25、27楼。公社武斗指挥部早先已设在44楼。“公社”对“井冈山”形成了包围圈。

从3月26日至4月27日，“公社”与“井冈山”的两派武斗队，就是这样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步，我一步；步步升级，把整个校园变成了武装割据的冷兵器战场。北大的武斗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没有侵略和反侵略的区别，没有正义的一方，两派武斗队都错。两派的逍遥派拒绝参加武斗，相对而言较为正确和正义，他们占了全校人数的90%。

4月27日，无线电系学生殷文杰从他所住42楼（两派混住宿舍）出来，走到44楼前面，被人认出是“井冈山”的，被“钢一连”的两个武斗队员刺伤。公社的胡宗式恰巧在场，他立刻上前阻拦并把殷文杰送往721医院抢救，终因不治身亡。出事后，很多人在44楼下面和38楼北侧院子里议论。我碰到孟关霖和扬子浪两人，二人满脸愤怒夹杂着忧虑。孟关霖说：“学校成这个样子了！没法呆了！回上海，回家。”扬子浪回应：“走，走！我也回上海，离开这儿！”

武斗发展到7月，校文革对井冈山占据的各楼，不时实行停水停电。两派的大喇叭不分日夜广播，吵得海淀居民不得安宁。有时两派的武斗队在校外马路上对打，不时阻断交通。这时两派的绝大多数人都已成了逍遥派，两派坚持武斗的估计也就各三、四百人。那时我和原“66”核心成员的一帮人，天天上午去图书馆，下午去颐和园游泳。武斗管不了，只好躲着走。你打你的，我凉快我的。

北大、清华的武斗已是天怒人怨。红卫兵运动已失去人心，且已脱离了毛泽东的文革轨道。毛泽东不是神，他已掌控不了学生运动。造反派对毛泽东已失去利用价值。1967年底至1968年秋，北大、清华及全国很多地方的派性斗争、武斗违背了毛泽东的指示，脱离了毛泽东的文革，不属于毛泽东的文革，而是属于错误潮流性质的人民文革。群众运动并非天然正确，人民群众也会犯错。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谢静宜的回忆书《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该书176页中写到，当时毛主席对谢静宜说：“现在工厂的形势比较好，大多数工厂都联合了，形势逐渐好起来，唯有学校的形势不好。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这时主席非常生气，继续说：“他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也脱离了他本派的大多数。他们的头脑膨胀，全身浮肿……”。谢静宜披露，在1968年7月24日，毛主席向她交待任务：为制止清华大学武斗，“我的意见是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队伍，去同他们讲理。去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宣传中央制定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至于先去北大还是清华，请北京市商量定。哪一个学校问题最严重，就先去哪个学校，捅它这个马蜂窝。”

从以上毛泽东对谢静宜讲述的决定在“7·27”采取重大战略行动，派工军宣队开进清华、北大，可看出毛当时的心态和心理活动，可以看出：1、毛对红卫兵运动严重失控很恼火，说“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2、毛很清楚校园里坚持武斗的人员是少数，说那些坚持武斗的人“也脱离了他本派的大多数。”清楚地知道武斗已丧尽人心。3、毛决心抛弃造反派，以新的力量代替学生运动。他让8341部队“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队伍”，组成工军宣队开进清华、北大，“捅它这个马蜂窝。”毛此时对学校造反派头头的憎恶之情已溢于言表。

## 6、弟妹上山下乡，家庭破散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此“最高指示”的发表，掀起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全国的初中生、高中生1966、1967、1968三届所有学生，时称“老三届”，初中加高中，共六届，统统要上山下乡，只有少数人进了工厂，高干子弟大多走后门参了军。于是发生了城市人口向农村的大迁移。从1967年到1977年，从城里下到农村有2000多万知青，影响了城市所有家庭的正常生活。

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发表上述毛主席“最新指示”时，同时还刊登了一则报导，并以横贯全版的大标题标出题目：“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个横标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政府无法介决城市400多万无业青年的就业问题。那时，大学已不招生，工厂已不招工，城市的几百万青年要吃饭，怎么办？上山下乡政策应运而生。所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闲饭。”两只手在城里已没用，只能去农村拿锄头，种地吃饭。

其实早在1968年12月22日中央总动员知青“上山下乡”之前一年，毛泽东、中共中央已做出这个决定。北京市从1967年年底，已开始在所有中学动员、安排“上山下乡”。我的弟弟王复明是北京男八中初三学生，八中有许多高干子弟，中央有什么决定，有关信息能很快传到八中。1967年底时，王复明一个同班同学的母亲是西城区区委书记，这个同学告诉小明，中央决定全国所有中学生都要“上山下乡”，城里一个不留。于是小明很早做好了思想准备，并十分注意有关的消息和安排。

68年1月至3月，八中先后贴出过三次布告，第一次是报名去北大荒军垦农场，小明马上报了名，但没有批准，因为北大荒靠近中苏边界，出身“黑五类”的不够资格；第二次是报名去汉中汽车制造厂，此厂同时生产军用卡车，小明赶紧报名，又因出身问题没被批准；第三次是报名去青海铸造厂，小明积极报名，这次批准了。此厂位于青海乐都四面环山的山沟里。但好在是工厂，小明很高兴。他3月4日离开北京，先去洛阳拖拉机厂培训一年。一到工厂就碰上一件事，他们的宿舍被对对面的北京中学生放火给烧了。北京某些中学生把派仗、武斗带到洛阳工厂来了，在北京打派仗还没打够。

第二个离家下乡的是小妹王丹戈，小名是小燕，当年是北京39中初三学生。她和小明是双胞胎、一对儿双儿。39中组织学生去内蒙河套地区下乡插队。小燕与几个同学被分到河套地区林河一个生产队插队当社员。她大约于68年5月离京，小明赶回北京为小燕送行。小明告诉我，火车一开，月台上成千上万送行的人和火车里挤满的学生，共同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哭喊声，那场面，小明说他终生难忘。那时上山下乡是怎么回事？知青们将面临什么样的生活和环境？由于已有前几个月的实践，已有大量信息传回城里千家万户。

## 7、为大妹插队，去农村老家探路

大妹妹王丹娜在北京25中上高二。她患有关节炎和严重皮肤病，双手一沾水就会全身长小红疹。父母为此整天发愁。那时允许回自己籍贯老家农村插队。7月初，父母让我到父亲老家辽宁省抚顺市莲岛湾村看看，找亲戚探探路，看亲戚能不能照顾王丹娜去插队，但又担心去到老家会受祖父问题的影响，让我实地了解一下，看到底是否适于王丹娜去插队落户，调查之后做决定。

7月初，我先到沈阳，然后去抚顺。在沈阳时，去看望了表哥项忠明，他在沈阳农学院上大学。他告诉了一个令我万分震惊的消息：沈阳农学院教授、与父亲一起从美国归国的吴煦生，被农学院学生打死了。吴叔叔原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所任研究员。他与父亲是好友，每过一、二个星期就来看父亲。父亲1957年成了右派后，他仍每过一、二周来访不误。他为人和蔼可亲、温文尔雅、脸上永远挂着微笑。三年困难时期，父亲下乡劳动改造，有一次他听父亲说吃不饱饭，粮食定量标准太低，马上从上衣口袋里拿出几斤粮票送给父亲。那时买粮食、下饭馆，都要用粮票，光有钱没用。特别是在61、62年，每人粮食定量，粮票极其宝贵。吴叔叔赠送粮票一幕，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在我印象中，吴叔叔是个仗义、可亲的长辈，怎会被大学生用棍棒生生打死了呢？我深感东北这地方，阶级斗争太惨烈了，太左了！

在沈阳过了一夜，第二天到了抚顺，旋即下乡到达莲岛湾村。见到小爷王卓文（祖父的堂弟），我告知他来的目的，并重点打听村里对祖父王卓然有什么说法。王卓文说，曾听到村里大喇叭广播，说反动官僚王卓然被抓起来，专政了！回到北京，我把情况告父母和王丹娜，并对丹娜讲：“你千万别往火炕里跳！你有病，不要去任何地方插队。学校不能把你怎么样。”我那时对上山下乡、和贫下中农结合这套说教，不同于几年之前，已有了看法。我把吴叔叔遇害身亡的消息告诉父母，他们被惊呆，悲痛万分。

此次7月初的东北之行，我来回花了七、八天时间。

王丹娜听了我的话，硬着头皮顶着，从没报名上山下乡。1970年夏天，25中召集还在城里没下乡的学生家长开会，动员下乡。我去开了家长会，会上与学校干部大吵一架。我说：“王丹娜有病，家里兄弟姐妹走光了，母亲又有心脏病，需人照顾。王丹娜坚决不能走！你们要有点人道主义！”25中搞动员的干部、老师没见过这种家长，一点辙没有。丹娜的北大哥哥给她壮了胆，硬是没按“最高指示”办，后来被分配到西城区一个街道工厂当工人。

## 8、毛泽东7、28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

7月27日夜，毛泽东亲自派8341中央警卫团及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等61个工厂、企业三万多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校园，宣传停止武斗，并强行拆毁武斗工事。工宣队员手无寸铁，手持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进入清华。中央文革、市革委会事先既没通知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红代会主任聂元梓，也没通知市革委会常委、当事人“清华井冈山”的头头蒯大富。清华的武斗与北大不同，清华两派已开始使用真枪实弹。工宣队没进北大，反而进入了由两派青年学生掌控的清华。结果，蒯大富认为有“黑手”要摧毁清华“井冈山”，下令武力抵抗，打死了五名工人，打伤了十几个。从7·27的客观形势分析，当日非出现伤亡不可，势必发生严重事态。从当时的情况看，这种效果，不能不让人认为：这正是“上面”等着的，需要的。

7月28日深夜2点，市革委会通知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到人大会议堂，中央首长召见。蒯大富很晚才被找到，很迟才赶到会场。这次是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及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黄作珍陪同召见。

毛泽东在召见会上，有些话说得很重，如：“蒯大富要抓黑手，”“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结果去了三万

人。”“你们搞了二年，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最令我震惊的话是：“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干涉，用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毛泽东挑明了，要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干涉大专院校的运动了。毛泽东还扯出表面上毫无关联的广西“四二二”造反派来说事。当时广西的造反派一直处于在野地位，两派武斗不断。中央有个“七三布告”，毛泽东批示“照办”，是针对广西发布的。这是全国第一个允许正规军剿灭不停止武斗的造反派。毛在召见会上说：“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此处为军事镇压开了口子，至于其前提，什么叫对武斗“坚持不改”？就很难说了，到了地方上就只由得地方政权解释了。这一政策此后极大地影响了边远省区的文革，出现了大规模武力镇压人群的流血事件。

第二天7月29日，聂元梓在全校大会上传达了这次毛主席的召见会。我听了传达后，感到北大的武斗终于可以结束了，两派可以联合了。同时明白了一件事：红卫兵运动结束了。予感北大两派头头可能都得挨整。

聂元梓说，她和蒯大富在7·28晚上召见时，不约而同地感到“毛主席不要我们了。”他们的感觉是对的。他们只是没有想到，工军宣队进校后，整他们整得那样厉害，聂元梓被审查、挨整了七年（不算文革后被判刑。）造反派已无利用价值，毛泽东此时已把注意力转移到恢复、重建中共一党专治的体制。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毛泽东在7·28召见时提到了“七三”布告，提到了广西“四二二”，多年后才逐步了解到毛的意图极其影响。首都工军宣队7·27进入清华时，就是打着落实“七三”布告的旗号。在7·28前后。韦国清、广西革委会打着执行“七三”布告的旗号，对在野的“四二二”派，出动军队、民兵，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围而歼之。军事围剿发展到县、乡一级，发生了大屠杀。打死了84000多人。这是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至今尚未彻底清算。广西的屠杀风，很快波及到广东、湖南，这两个省也都发生了由上而下的大屠杀事件。这一史实，已被许多海内外文革史的研究者，记为中国当代史的重大事件。68年7、8、9、10四个月，两广、湖南的大屠杀，与7·27首都工军宣队进入清华，与毛泽东7·28讲话，显然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 原载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